

坚守“本立道生”的学术信念

——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

宋世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行政学学科带头人,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研究,专著有《美国行政改革研究》《中国公务员法立法之路》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优秀MPA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马长俊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世界创新如大海,但愿点滴出我家”,这是宋世明老师在2018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代表获奖者发言时表达的心愿。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生长于齐鲁大地、胶州湾畔的他,深知涓涓细流汇入浩瀚大海,才会有永恒的生命。正是将对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宋世明老师坚守“本立道生”的信条,在做学问的路上毅然前行,找到属于自己的愉悦。

博观约取 中西融通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道路,这是当代政治学人的时代使命。宋世明老师的硕士求学时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浪潮开启,他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世界坐标系下看中国发展,在前人基础上谋未来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于是,他决心在今后的政治学研究中,寻求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路径。

宋世明老师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深受导师李景鹏先生思想的影响,他广泛涉猎中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就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

美国的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研究,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美国行政改革研究》一书。该书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美国行政改革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地透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取向及其内在规律。宋世明老师认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是探索适用信息社会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实质是以“规则间的选择”取代“规则内的选择”。面对政府“做什么”的问题,首选市场交换制度;面对政府“如何做”的问题,将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优势综合配置以提高政府履职尽责能力;面对政府责任机制,“以结果为本”扬弃“以规则为本”。这一思想体现了宋世明老师的学术认知与研究方向,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中西融通的视野、协同共治的范式成为他探索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世界的罗盘。其后,他多次撰文或授课,对中西方行政改革和协同共治进行阐述,2009—2010年,他前往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探讨和思考后,2016年出版了《美国行政改革研究》(修订本)。

传道授业 甘之若饴

政府治理现代化养成于政府解决具体现实公共问题的长期修行,宋世明老师自1997年到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任教至今,21年间始终关注于政府治理现代化之道,忠诚于

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

原国家行政学院是培养国家中高级公务员的重要学府,这里经常有来自各中央部委、各地方省市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前来培训进修。三尺杏坛,四季如常,宋世明老师积极传播现代政府治理理念,查究政府治理难题,探讨政府治理创新,每每与学员交流有所收获,都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宋世明老师常常说,“身为一名教员,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正是追寻这份幸福,他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勤耕不辍,乐此不疲。为了高质量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宋世明老师坚持向经典求解、向实践学习、向学员交流、向同事请教,围绕各班次教学目标与学员特点,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地开展教学调研,不断夯实学理和实践基础,力求掌握实际、了解前沿、预判规律、创新方法,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解读中国国家治理。厚积才能薄发,台下的精心准备换得台上的气定神闲,宋世明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准确透彻的阐释、热情坦诚的交流,赢得了学员们的的好评和肯定。宋世明老师2013年、2017年获得原国家行政学院优秀教学奖一等奖。在国际交流中,宋世明老师受组织委派,参与大量国外政府机构高中级公务员来华学习及赴古巴、墨西哥等国讲学活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

自原国家行政学院开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以来,宋世明老师每年上半年为公共管理博士生开设课程《公共

行政学经典著作导读》,师生彼此精深研读切磋,寻求“脱胎换骨式”开悟;每年下半年为MPA学生讲授《公共管理学》,将协同共治方式运用于公共管理教学,课堂教学成为了师生协商、协调、协作、协同的教学共鸣曲。

孜孜以求 良政善治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治理之道,有继承才能根深,有创新才能叶茂。宋世明老师深信大道至简,唯有潜心治学、砥砺前行,做缓慢而深刻的学问,才能创新精进,行稳致远。他在与博士生交流时指出,“社会科学就是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严密。要按照科学的标准踏实严谨做学问,按照科学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要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信息中理出头绪,在看似混沌的研讨交流中找出线索”。这些都源于宋世明老师多年来立身立言的践行,没有孜孜以求的扎实功底,哪能有穷理于事物始生之际的功力呢?

近年来,宋世明老师将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方法应用于现实研究,决策咨询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国家软科学项目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宋世明老师怀着为学员提供中国化、有价值的公共管理教材的梦想,十余年间每年重构优化教材《公共管理学十二讲》,打磨精品,与时俱进,密切关注了中西方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与实践历程,吸收和建构了一系列理论模型、方法论,集中展现了他多年来对公共管理学科理论脉络与实践发展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世明老师坚信,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是中西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协同共治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大数据时代的大势所趋。他希望,将协同共治的基本理念、运行机制、运作方式融入深化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治理现代化进程,理论与实践同频共振,实现良政善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文明进程中依然彰显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当人类面临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迎向马克思。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开拓出新的境界,展现出令人振奋的理论气象和学术品味。其中,方法论的自觉和创新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枢纽,因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先行决定着一种哲学得以呈现的基本形态。

总体而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本学—文献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进行细致而缜密的重读、考证和阐发,通过文本的深度犁耕和文献的精细考据(特别是关于MEGA2的研究),试图重新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语境和问题指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文本几乎都被精读过。“回到马克思”作为文本学—文献学方法的理论旨趣,其实蕴含着明确的时代要求,即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语境的基础上,获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认识。应该说,文本学—文献学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本清源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的旨意及其当代意义也有赖于这种方法的开启。但是,文本学—文献学方法必须充分考虑到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解释学间距,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历史性处境决定了那些被唤醒的文本只能是时代生活可以理解的文本。

第二,创造性诠释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各种思想资源中汲取灵感,它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主要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形成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一度成为创造性诠释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中介,同时,创造性诠释的方法凸显“实践本体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转向”,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的互动与呼应,以此激活和体认这种哲学特有的理论品格及其生命力。无疑,创造性诠释的方法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所拥有的可能的意义空间,与时代精神的内涵加以融合,力求体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应该说,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地回应时代挑战,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生命力,以及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必要张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创造性诠释的方法需提防“过度诠释”的误区,谨防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

第三,问题引导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当代社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切入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它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面对当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孙成竹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特别是面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全新而复杂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进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如果拉长视野,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与研究重心的每一次转换,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要求密切相关。可以说,这种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正好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品格。需要注意的是,哲学拥有自己处理现实问题的独特方式,问题引导的方法必须在穿透现实的基础上,保持对现实的既辩护又批判的意识和能力。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旨在打破方法壁垒,形成融会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从而更为恰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语境,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逻辑结构思想的

□ 黄力之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坚实基础。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回味并深入领悟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不只属于19世纪,而且具有穿越时空的功能,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其形成了科学分析审美特性的逻辑结构,从而引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正确发展。

审美实践是审美经验总结的基础。马克思美学思想对审美特性的科学分析,首先在于坚持实践性原则,即审美实践的原则。英国学者希·萨·柏拉威尔在1970年代出版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详尽地记录并阐释了马克思一生的美学与文学艺术言行,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学”这个词,说明马克思对人类全部审美经验是充分尊重的——他关注了从古代希腊的文艺到19世纪的文艺发展史,不同国家的重要作家作品均是马克思审美理论的经验来源。柏拉威尔由此说:“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作为一个高度重视人类实践经验的思想家,马克思是从全部审美实践经验中,而不是在主观臆想中去总结审美文化的性质、规律与特

征的。

马克思的这一原则,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那就是唯物史观,即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也就从那里开始的原则。恩格斯晚年诠释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脱离历史经验。由此,文艺史事实是审美批评的出发点,但文艺史不能外在于历史而单独存在。必须置于全部历史,才可以见出审美现象的奥秘,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美学理论与别的美学理论之根本区别。

审美发生的最高意义在于人的本性。将文艺史甚至整个审美现象置于全部人类历史,马克思发现了美学史上的单一性思维的局限——要么只从艺术主体的意志来认识审美特性,要么只从社会存在的制约来认识审美特性,马克思是从最原始的关系——人与自然之关系,来深入认识审美特性奥秘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审美并不是人的自我意志的结果,也不是社会存在从外

面加之于人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在马克思的理论架构中,人的生产本身就具有两个层次,一层是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层则是“不受肉体需要影响”的生产,只有在前一层次的生产之基础上,人才能进入后一层次的生产。这时,人的生产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生存需要,而是超越实用性,生产一种能够激发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即“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的理论在大量的史前文物考察中得到证实:人类最早的生产工具只有单纯的实用性功能,到后来才开始在工具上进行涂饰——这种涂饰就是美的造物,并无实用功能。而这种涂饰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人的自由本性的形成。马克思将审美自由置于劳动实践自由的基础上,作为劳动自由的一种必然延伸,科学解决了审美自由的发生学问题。

审美特性即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马克思的逻辑结论意味着,人是艺术活动的出发点和中心,但人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受制约于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从不认为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因而,对审美现象进行社会关系的批评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是,审美特性何在呢?这不是社会关系能够自行说明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审美特性的认识同样符合全部审美历史的:他以直观性为前提,论证了人的感性生活是审美直观性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本性的形成,来自于人的“改造对象世界”这一劳动实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由于人的一切造物,特别是物质生产形式的造物,都取物态化的形式,人可以在这一物态化的对象中

观察到自己的本质力量,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直观性的存在,比如工业生产创造的对象就是如此。但是,审美造物与工业造物还是有区别的,工业造物主要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审美造物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马克思认为,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性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这一判断,最适用的就是审美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这就意味着,审美对象中的人不是概念化的,而是感性形式的,首先是人的全部情感生活。

